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道」指公正的社会准则。「公」为人民、为大众，人不独亲，不独子是去私的本质要求，其主旨是大公无私。今天，如果我们把「大道之行」贯彻为公平、确定、便利、经济的征税准则，「天下为公」执行为「利为民所谋」的公共财政理财方针，四千年前产生于公共需求的中国财政又重新以其公共性为归宿，那么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就离我们不会太远了。

# 大道之行

DADAOZHIXING

ZHONGGUO CAIZHENGSHI

大道之行

上

翁礼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财政史



# 大道之行

中国财政史

上

翁礼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DADAOZHIXING  
ZHONGGUO CAIZHENGSH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道之行：中国财政史/翁礼华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8

ISBN 978 - 7 - 5058 - 8492 - 2

I. 大… II. 翁… III. 财政 - 经济史 - 中国 IV. F81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2709 号

责任编辑：刘明晖 孙旭明

技术编辑：董永亭

装帧设计：刘 炜

大道之行

——中国财政史

翁礼华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800 × 1092 16 开 77 印张 770000 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 - 7 - 5058 - 8492 - 2 定价：380.00 元 (上、中、下)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代序：财经与人生的文化透视

**主 题：**财经与人生的文化透视  
**演讲人：**翁礼华  
**时 间：**2007年3月13日  
**地 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公共财政论坛

非常高兴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财经与人生的文化透视”这个话题。

## 人类的三大终极目标

大家知道，人有三大终极目标，其中两个终极目标是人的天性。第一个是追求自由。所有的动物都是追求自由的，没有一匹马希望自己被马络头套住，没有一只小狗希望有一个项圈把自己的脖子圈住；人也一样，也希望自由，所以让人坐监牢就成为一种刑罚。

同时人还有少数动物所拥有的天性，也就是第二个终极目标，追求财富。羊是不追求财富的，它在大草原吃完草以后就跑了，没有想到要把草带点回去。人不光想把草带回去，而且还要把它变成钱，进而变成信用卡。也有少数动物跟我们人类

差不多，经常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互相感染，共同成长，所以也追求财富。比如说老鼠，以前我们住的砖木房子里，老鼠是跟我们紧密生活在一起的，只不过作息时间与我们相反，我们睡觉的时候它才开始追求财富的活动。还有我们住在砖瓦结构的房子里，假如饭掉在地上，你就会看到有一批动物把这些饭搬走，这是什么？蚂蚁。但是老鼠和蚂蚁追求财富的最大特点是追求自然财富，它们不可能创造新的财富，而人却可以创造这个新的财富。

创造财富，一个人能创造吗？不能创造，比如说我们要把山上砍伐下来的木头搬下来，这个大木头一个人的肩膀扛不了，得好多人一起来扛，扛那个木头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来喊口令“一二、一二”，才能步调一致，把木头扛下来。

我们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要让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只有通过优化配置以后才能产生效益，这是我们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而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人跟人有着协调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和谐是人类从自由和财富两个天性里派生出来的第三个终极目标。因为所有人都喜欢自由，而创造财富又不能让大家太自由，得有约束、规范和协调，所以才产生了和谐。那么什么叫和谐？象形汉字和谐的“和”左边的“禾”就是粮食，右边是个“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人有饭吃。“谐”是什么？左边是个“言”右边是个“皆”，就是人人能讲话。人人有饭吃，是生存权，人人能讲话，是民主权。有了这两条，社会就和谐了。大家知道吃饭的“饭”字怎么写，左边是一个“食”，右边是一个“反”，这是什么意思？有食就是饭，没有食，就会出现有人登高一呼“要饭吃的跟我来”，那就造反了。所以“稳”字由“禾”和“急”两个偏旁组成，只

要有粮在手，生存问题解决了，人心也就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中国的文字也是初级阶段。世界上所有文字开始的时候都是象形字，后来才慢慢上升为抽象文字。英文就是一种抽象文字，它的字义与字形无关。而汉字至今还是象形字，它的好处，不管全国各地有多少种方言，对同一个字的发音尽管存在差异，但只要是中国人看到同样的方块字都能理解，从而扩展为对国家的认同感，保证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基本统一。而使用抽象文字的欧洲，由于发音的差异产生了文字的差异，进而在一小块土地上衍化为很多国家，直到今天才开始研究欧洲的一体化问题。当然使用象形字虽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好的形象思维，但毕竟是初级阶段的文字，千百年来影响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因为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抽象。

### 人性差异源于文化不同

人有男女之别，也有中西差异。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在智力上没有高低之分。毛泽东曾经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是指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而不是说男女没有生理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别。既然上帝造了女人又造了男人，男女还应该是有所差别的。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左脑部位与人的语言和手工活动关系密切；右脑与人的空间能力和思考能力息息相关。由于男人的大脑右半球占优势，女人以左半球为主导。所以，男人一般以空间思维、推理及思考能力占优势，女人一般以运用语言和技巧取胜。这就带来男重概括，女重分析；男较果断，女多慎重的不同。但这些差异并不说明优劣，而是各有千秋。

男女之别大致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富于理性的男人

容易把生活当成戏，而富于感性的女人则容易把戏当成生活，极易进入角色。其次，在交谈表现上，善于观察的女人专注对方的表情较为细腻，而男人则更关心对方的谈话内容和原则。第三，在思维差异上，女性一般长于形象思维，男性则长于逻辑思维。第四，在脾气上，男性大多较为沉稳，不擅发泄，而女性则易激动、喜唠叨、爱发泄，常被小事烦恼，免不了出现“女人脾气好像天气”的突变情景。第五，在选择与占有的区别上，女性喜选择，男性重占有。女人折磨男人最好的办法是领他逛商场，让他在没完没了的选择中去烦恼。

中西人性差异很明显，在当前个人所得税报税中，就反映出来了。大家知道，国家税务总局通知，个税申报到2007年3月31号截止。到3月6日只有40万人报税。这个数字跟税务局掌握的人数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最早报税的人不少是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有港商，有华侨，还有外国人。中国人为什么不争先报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关系。中国人认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先报税的人是“出头椽子”会“头先烂”，所以他就不敢先报，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叫恐后不争先。什么叫恐后不争先？譬如机关干部开会，来得早的人，绝对不坐第一排，因为他认为第一排是领导坐的，他要显得谦卑一点坐在后面几排。同样开会发言的时候，也会万事开头难，出现冷场，很少有人主动发言，弄得主持人只好指定某人先发言。而当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反而都争着发言了，这就叫恐后不争先。

在领导机关，电梯出口谦让得没有人敢先走。大家认为要像报税、让坐一样，让作为尊者的领导先行。这便是中国人的内敛文化。内敛是什么意思？我们用筷子吃饭就是内敛思想的外化，筷子夹菜要往里使劲，而外向文化的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使用刀叉吃饭，往外使劲。古代的中国人相见时两手抱拳，内敛地作揖打

躬；而西方人则外向地握手拥抱。中国人崇尚内敛，反对张扬，连年纪大了吃饭都得慢慢吃，走路也得慢慢走，才显得稳重。对待客人也会以“慢慢吃”、“慢慢走”的内敛语表达对客人的关心和尊重。

有一次，参加浙江作家节的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就问他：“你是‘曾学’专家，写过很多关于清代名臣曾国藩的书，能否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曾国藩的特点？”他不假思索地用五个字告诉我：“低调，不张扬。”

我们现在提倡以人为本，而曾国藩他们所尊崇的儒家思想并不以人为本，而是以道理为本。“道理”一说来源于北宋的“道学”，南宋和明朝的“理学”，这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等学者将西汉董仲舒原本神学化的儒家思想哲学化的成果。儒家思想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它要求一个人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目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是与非的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有认知的差异。假如是非是一个圆，外国人会通过圆心画一条竖线，把它分割成两个半圆，他们认为一半是NO一半是YES，是非分明。而中国人却在圆中间画条S形的线，分割成首尾相继的两条阴阳鱼，阴鱼里有阳眼睛，阳鱼里有阴眼睛。古代《易经》将这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现象称之为“互藏其宅”，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说，中国人认为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是并非全是，非并非全非。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有客人来访，主人一定会问他喝什么，咖啡、绿茶、红茶或者矿泉水，外国客人会肯定地回答，而中国的客人只会客气地说“随便”，让主人自己揣摩。所以外国人做人比较简单，中国人做人就比较复杂。

大家知道人性的差异也是一种文化的差异。那么什么叫文化呢？广义地说，人



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文化。自从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的定义以来，至今文化的定义已有数百种之多。因为早在1952年两位美国学者收集到的从1871年至1951年前后80年间世界上对文化的定义就已有164种。其实人的言行举止都是文化。假如把文化说得狭义一点，我们就能理解饮食文化中什么是饮食，什么是文化。宴会就餐的时候，喝的酒，吃的菜都是饮食，它落到胃里，而南瓜雕出来的凤凰，萝卜雕成的山羊则是文化，因为它不能落胃，但能走进你的眼睛，使你内心感到愉悦，两者合而称之，就成了饮食文化。可见，文化也是人化，是人类由心而生的自觉。凡是动物不会干，只有人能干的事就是文化。如动物不抽烟，人能抽烟就是烟文化；动物不喝酒，人能喝酒，就是酒文化；动物不喝茶，人能喝茶，就是茶文化……人因为有文化，菜肴丰富，餐具繁多；而动物没有文化，既无餐具可言，也无品种繁多的菜肴和花色齐全的主食。例如，在丰盛的宴会结束后，餐桌上剩余的饭菜统统倒进泔水桶，那就成了猪的饲料。饲料与饭菜的差别就在于讲不讲究色香味形，讲不讲究专业化细分。一般来说，混在一起吃下去的是饲料，讲究色香味形，分开来一样一样吃下去的便是饭菜。酒水饭菜是人的饮食，饲料是动物的食物，人们常见的菜泡饭就是离饲料不远的一种饭菜。人的文化也是游手好闲的产物，那些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才有可能潜心研究文学、艺术、书法、绘画、音乐等与生存没有直接关系的東西，难怪中国古代文化人大多产生于鱼米之乡和富裕家庭，诸如明清两代201科会试，竟有102名状元出自富裕的江浙两省。

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也不同。就拿餐具文化来说，西方人用刀叉，中国人用筷

子，也有一些民族直接用手抓。至于吃饭，中国人习惯于聚桌共餐，按尊卑关系排好位置，先请长者、尊者入座，人齐了才能动筷。动筷也有次序，尊长者先夹菜，但也只能象征性地夹一点，不能夹得太多，以示其高雅。而且这顿饭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实行各自付款的AA制，而由一个有身份的人埋单以示其大方。西方人大多不聚桌共餐，即使聚会也是各点各的菜，各花各的钱，不吃别人的菜，分得很清楚，个人意愿颇受尊重，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平等，这就是文化差异。

世界上的文化，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大陆农耕型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应该是这类文化。另一类是海洋商业型文化，主要是欧洲，也包括现在受欧洲影响的美洲文化。还有一类是沙草游牧型文化，主要是中亚、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

大家知道历史环境影响文化。中国有个“公”字，跟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有关。在商周时代实行井田制，“井”怎么写，两横两竖，分割成九个方块。当中这个方块是公田，边上八块为私田。当时税收制度规定，八户人家要把当中这块公田种好，收获的农作物上缴给国家作为税收。所以就有了这个“公”字。上面是八户人家的“八”，下面是私营的“厶”。这就意味着“八私为公”。为什么现在的“私”字左边有“禾”偏旁，古代没有“禾”偏旁呢？这是社会专业化发展的结果。就像以前的大学专业分工很粗，民国初期数理化是一个系，今天光数学就可以分出包括力学、计算机等很多学院一样，以前一个字也能代表多种意思。现在随着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也成了一字一义。如第三人称原来只有一个“他”，后来根据对象不同分成了“他”、“她”、“牠”、“它”四个字，分别代表男、女、动物、物体四个第三人称。如“牠”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里我常常能看到，后来人们认为分得太细了，用起来不方便，于是把“牠”与“它”合并了，简化为用“它”来代表动物和物体的第三人称。

大家知道商周时代，中国是一个实行井田制度的农耕国家。一井八户人家必须集体劳动，共同耕作。为了获得好收成，人们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农时变化的“二十四节气”，找到了耕耘、育苗、插秧、灌溉、施肥、培育、收获的农业生产规律。从而使强调循序渐进、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而西方人的文化是什么？它源于希腊文化。希腊是地中海西北部的一个山区国家。人们不是靠上山打猎，就是靠下海捕鱼来谋生，因此个人的技能非常重要，从而产生了张扬的个人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而中国人则与之相反，认为“大河有水小河满”。

大家知道汉字的“心”字，由三点一钩组成。我曾开玩笑说，如果三点中中间一点是儒家文化，两边两点分别代表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然后用一个钩子钩起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解决人心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佛家和道家文化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犹如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大身是儒家文化，两翼分别是佛家和道家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首《神童诗》把它的要义阐述得淋漓尽致。这首诗是北宋两浙路鄞县凤岙乡一个叫汪洙的神童写的，他长大后也淹没在茫茫的人海之中，“江郎才尽”也许是大多数神童人生轨迹中的最后结局。

道家文化重视人的自然价值，提倡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注重养生，道法自然。这对老年人十分有用，它使老年人远离世俗的得失之争，活得更自然、更潇洒，能达到延年益寿的神效。道家祸福相倚，物极必反的辩证思想与孔子的道德文章一样启迪了无数中国人的智慧。

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外来宗教，宗教是一种哲学，但哲学并非都是宗教。佛



教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善恶相报，四大皆空，同时它又告诉你死后能投胎转世。世界各地都有宗教，因为宗教能保证你灵魂不死。中国化的佛教对惨遭不幸的家庭、对离死亡不远的老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善有善报的来世，他们积善积德，忍辱负重，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极乐世界。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就不同文化来说，它首先是多样性，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例如美洲本土的印第安文化与来自欧洲的欧美文化，不能以落后和先进来区分，如果说印第安文化是落后的文化，来自欧洲的文化是先进的，那么就会得出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消灭印第安文化的行为是合理的结论。显然这是个谬论。对不同文化而言，存在就是合理的。而且文化没有大小之分，只有繁荣萧条之别。对同种文化而言，才有先进落后之分。例如中国人过去出恭的茅厕不用水冲，臭气冲天，现在向西方人学习改用抽水马桶，形成了比过去先进的厕所文化。

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正在逐步地融合，如中国老一辈人请客通常是请客者埋单，你请得起就请，请不起就用不着瞎咋呼，不搞AA制。而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就餐时AA制很流行，今天我在餐馆里看到北大学生用餐基本上都是AA制。

### 耻于言利的儒家文化

有人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宗教，所以又叫儒教，与道教、佛教合称为“三教”。儒教的教主就是皇帝，有一个故事就与清代的康熙皇帝有关。故事说康熙皇帝下江南来到扬州，当时有一个老和尚陪着他，他就问那个老僧，运河上有这么多船来来往往，到底有多少条船？这个和尚回答他说河上只有两条船，一条是利船，一条是名船。康熙皇帝又问他，你怎么知道只有两条船？他说，我当小和尚的时候师父曾经

让我天天去看运河里到底有多少船，我看了好几年，开始时从早到晚认真地把过往船只的数目记下来，师父都说不对，后来慢慢才领悟到人生只有名利两条船。那天向师父汇报时，师父高兴得直点头。可见，儒教教主眼中也是有名有利的。

儒家文化表面上崇尚伦理，耻于言利，以显示其崇高，其实也并不是不需要利益。孔子就曾经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司马迁在《史记》里更明了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恰似文学语言的话比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人都会寻求利益最大化”要生动得多。可见，不同文化对某些问题会有不同切入点和说法，但在本质上却往往有相通之处。

人来自动物，但又超越动物，所以人与动物一样，有追求利益的一面，但又有超越动物的人性。只不过，儒家为了建立“尊卑、长幼、男女”有序的伦理秩序，而不得不强调重义轻利。犹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缺金缺木的人会用金木当名字，还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才会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语写在墙上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贫而乐”，“贫而无怨”，“富贵于我如浮云”，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以至于造成中国人怕露富、富者不仁的心理。富人的利益被侵害，甚至被人打伤打死，旁观者常常都会幸灾乐祸地说“活该”！

大家知道儒家重面子，讲客气，视口是心非为觉悟。比如说我们到刘怡教授家里去，刘老师就会忙着给我们倒水，我们一定会口是心非地说“坐一会儿就走，用不着倒水”，倘刘老师真的不倒水了，我们心里一定会直嘀咕，刘老师真的这么不客气吗？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心口不一是一个人不诚实的表现，长此以往会导致精神

分裂。而中国人则认为这种心口不一的客气，是一个人应有的修养和水平，是善于处世的表现。

中国人的这种假客气源远流而流长。早在大禹建国的夏朝，就把向部落强制征收的税收称之为自愿的“贡献”，而把不愿贡献的部落酋长又以开会迟到之名将其残忍地处死。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其国土落差是世界各国平均落差的三倍，所以水流特别湍急，最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患不绝。因此中国在建立国家的时候就推选了著名的治水专家大禹担任首任国家元首。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大禹决定向各部落强制地、固定地、无偿地征税。为了把话说得好听一点，他就把税收客气地称之为“贡献”，看起来很尊重你的意愿。结果有一个统治今浙江德清境内的部落酋长望文生义，拒不贡献。对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大禹极为不满，于是在今浙江绍兴柯桥开了一个相当于今天的税收汇算清缴会议。不想贡献的防风氏没有准时到会，大禹便三番五次地派人渡过钱塘江催他参加，而姗姗来迟的防风氏进会场后不仅不认错，还态度傲慢地拒绝补税，大禹一怒之下将其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防风氏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于不纳税而被中央政府杀头的地方长官。由于儒家文化耻于言利，崇尚伦理，认为以不纳税之名将人杀头显得不够高尚，而以开会迟到的犯上作乱之名将人杀头才符合伦理。因此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用儒家精神记述了这件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历史上的防风氏就成了开会迟到被杀的典型，其实迟到是罪不至死的。会后，大禹把这座原来叫茅山的山脉改名为会稽山，古代一字多义，“稽”与“计”同义，将山改名反映了大禹对“会计”工作的重视。

今天，学校向择校生收费也与大禹收税一样是强制的、固定的，但同样会以好



听的“赞助费”之名向家长征收。至于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也以自愿捐助之名在交通要道设卡，向过往客商征收1%的商品通过税，还美其名曰“捐厘”。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都希望有神灵保佑他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古代中国原本没有财神一说，到南宋时，由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人开始供奉财神。这时的财神无名无姓，没有具体落实到人，是抽象的综合财神。到了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财神就功能各异地具体化了。文财神有比干、范蠡，武财神有赵公明、关羽，还有东南西北中五路财神。其中尽人皆知的武财神赵公明在成为财神之前是一个瘟神。为什么把出身不好的赵公明安排为财神呢？这与中国西汉武帝时代把百姓按“士、农、工、商”“四民”分类有关，当时的商人是最贱的，他们连丝绸的衣服都不能穿，这就难怪明清时特地安排曾经是瘟神的赵公明担任财神。其实不仅财神如此，就连佛教的五百罗汉也同样是改邪归正的产物。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有五百强盗成罗汉的传说，但纯属虚拟而无具体名称。南宋时，有个名叫高道素的人倾毕生精力一一落实名号，并碑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名号碑》，从此中国佛教有了有名有姓的五百罗汉。今天的北京碧云寺就有五百罗汉的塑像，其中最后一位是济公。济公是南宋时在杭州出家的和尚，原籍今浙江天台。他平时玩世不恭，如痴如狂，提拔为罗汉后又姗姗来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好趴在梁上办公。

财神庙前常常写着这样一副对联：“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一点事，朝也拜，夕也拜，教我如何？”可见，财神虽然法力无边，号称“有求必应”，但以有限财力面对人的无限欲望，其内心世界也充满着“有求难应”的困惑和无奈。

儒家的伦理文化就是等级文化。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想办法给它分出个等级来，就是吃饭开会也不例外。以前中国人用正方形的八仙桌吃饭，有上首下首之分，尊者长者坐在上首，卑者幼者坐在下首。后来人们发现八仙桌每桌能坐的人数有限，最多只能坐八位，而外国人召开圆桌会议的大圆桌却能坐很多人。于是在清末就被中国人引进为餐桌。中国人为了分出位置的尊卑，不惜绞尽脑汁把面对门口的那个位置确定为主位，然后右边是第一贵宾，左边是第二贵宾，背对门口的那个位置为副位，右边第三贵宾，左边第四贵宾。本来为了使与会者能平等相处的圆桌到中国就被改造成为不平等的餐桌。至于当今开会主席台排位置更是让负责排位的人伤透脑筋。如果排得不妥有失某人面子，轻则不满意，重则发脾气。

### 文化影响财经政策走向

大家知道，传统文化也影响财经政策的走向。和谐是儒家文化的最高追求，它由三方面组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即伦理道德；三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论语》对此作了专门的阐述。在座诸君，你们只要自己跟自己过得去，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那世界上就没有人会跟你过不去的。

中国的儒家思想起源于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大儒，他们的思想观点大体相同，但不完全一致，是求同存异的典范。比如孟子强调“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的“正名”主张存在着差异；荀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与孔孟的“人之初，性本善”也截然相反。以老子五千字的《道德经》为

理论基础的道家文化，强调清静、无为、自然，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法，还使“轻徭薄赋”成了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仙丹妙药。连同出于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源于亲情的仁义道德和基于伦理的上尊下卑，这些传统文化观念都以它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财经政策的走向。

首先，综合分成是中庸文化在财政上的反映。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综合分成方式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所谓综合分成，就是中央财政按事先与各省市自治区商定的比例与地方实行财政收入分成，其特点是水涨船高。例如，1993年安徽省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按77.5%：22.5%的比例分成；上海市若不超过165亿元财政收入，只要保证向中央上缴105亿元，其余收入均由地方留用，若收入超过165亿元，超过部分地方与中央按五五分成。由于各地出于藏富于民、增强后劲的考虑，扩大了减免税范围，以减少地方收入的办法，减少了对中央财政的上缴。那时每年全国财政总收入增长200—300亿元，地方上缴中央只增长20—30亿元，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央财政陷入了困境。为此，1994年1月1日开始，中央下决心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由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两方面组成，其最终目标是让中央税和地方税按税种划分，分得更清楚，以便1994年8月开始分设的各地国税局和地税局能够各征各的税。结果十多年来的走向表明，由于中庸文化的影响，财政体制不是向分税制的方向前进，而是向综合分成回归，很多税种都成了中央和地方综合分成的产物，只不过改革前按总收入进行的综合分成，成了按税种进行的分项综合分成罢了。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一是所得税回归综合分成。1993年全国只有不